

透石见史

——《从刀铲到珠玉：华北地区的磨制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序

王仁湘

得知翟少冬即将出版关于磨制石器考古研究的大作,她希望我写一篇序。

这让我觉得高兴,又有些为难。这个题目一定是不错的,不过因为以往本人对专业下力有限,并没有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疏于了解,担心胜任不了这个担子。当然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尝试着写写,希望能起个导读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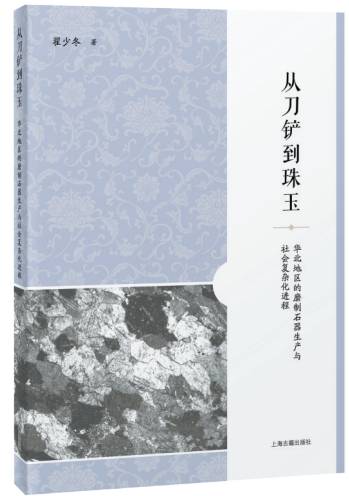
一面读着翟少冬的稿本,一面想起我与石器研究的渊源。想来我对石器的关注与研究,因为主攻新石器考古,在工作中曾经是有过涉猎的,对于石器标本也有过一些接触,偶尔还显出很深厚的兴趣。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以为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工具,曾经注意到石器资料的收集,写出了关于磨制双肩石器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整理西藏曲贡遗址发掘报告的过程中,观察过大量磨制与打制石器,第一次接触到不少半打半磨的标本。后来又在四川广元中子铺发现细石器作坊遗址,接着以北方细石器为建造进行大范围调查,发现了阿拉善苏呼图制作场,对于其中的细石器反复观察,获得了一些真切感受。正是在整理细石器发掘和调查报告中,同翟少冬副研究员有了协作的机会,请她帮助鉴定石器原料,也就有了进一步了解她研究成果的机会。

其实我和翟少冬认识是近20年前的事了,2006年她还在山西博物院工作,为筹备一个考古新发现展览,向我咨询有关喇家遗址考古的一些问题,但当时是通过电话联系,只闻其声,未见其人。2011年,翟少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工作后,我们就成了同事,见到了她本人,因为科研处的诸多事情,交流也多了起来。2023年因为撰写我在内蒙古苏呼图采集到的细石器报告,请她鉴定石料,我对她的研究了解得更多了一些。知道她从陶寺遗址附近的大崗堆山石器制造场遗址开始研究石器,这些年来断断续续一直从事磨制石器的研究,从大崗堆山到陶寺再到华北地区,研究范围和视野逐渐扩大,这本书就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柴尔德用“新石器革命”来形容新石器时代的开始,“革命”一词给人的感觉是一场突变,仿佛一觉醒来突然就是新石器时代了。但其实新石器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和农业这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要素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也并不是一出现就成为主流的。中国农业的形成是几千年植物栽培的结果,并最终在仰韶文化时期形成南稻北粟为主的农业生计模式,代替了之前的采集狩猎生计模式。同时,人们的居住模式也逐渐由游动变为在一个地点定居下来,在固定地点待的时间越来越久,为居住建造的各种生活生产设施也越来越多,居住模式逐渐复杂化,游动的居住模式逐渐被农业村落代替,这一过程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基本一致。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它的出现和取代打制石器的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翟少冬将华北地区分为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南部华北平原地区、东部海岱丘陵山区和西部太行山以西的晋陕高原四个片区,分别梳理了这四个片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的漫长过程。翟少冬认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局部磨制的石器在华北地区零星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磨制石器的数量和器形逐渐增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大部分地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成为主流生产工具。但四个片区的发展并不同步,相较而言,华北平原腹地地区发展最快,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磁山、裴李岗、沙窝李、裴沟北岗、长葛石固、贾湖等遗址中磨制石器的数量就已经和打制石器相当,在贾湖晚期时磨制石器的数量甚至超过打制石器。而周围地区包括和北部地区相邻的易县北福地遗址仍以打制石器为主,这些地区石磨盘和石磨棒的数量都较多,但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磨光属于使用磨光,不在因制作磨光定义的磨制石器的范畴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除了西部地区个别器形如盘状器、刮削器等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外,其他基本为磨制石器,但华北北部地区这一时期打制石器的数量仍然较多,较南的镇江营遗址直到后冈二期时磨制石器的数量才超过打制石器,但打制石器仍有一定数量。各地区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的过程,与各自农业成为主要生计模式的过程及定居模式的复杂化过程相一致,反映了磨制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与农业和定居的紧密联系。

本书的另一个精彩之处是对陶寺、二里头、殷墟三个华北地区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关键遗址石器生产变迁的论述。对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



着墨较多,这与翟少冬本人整理了大崗堆山石器制造场的资料以及主持了陶寺遗址石制品的调查和试掘工作有关,另外陶寺遗址本身也出土很多石器和可供讨论石器生产的石器加工的副产品,作为陶寺石料来源地的大崗堆山也出土大量石器加工过程中的石制品,因此对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讨论较多也就可以理解了。

陶寺的石器生产是作者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运用考古发掘、聚落考古、实验、岩石薄片分析等方法对陶寺的石器进行了特征、技术、原料、生产组织、生产规模和流通方式的讨论,为了搞清楚角岩/变质砂岩形成的地质条件,更是联合中国地质大学的白志达教授对大崗堆山进行了地质调查,并且分析了大崗堆山石料和陶寺出土石制品的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成分,从地质成因上分析了陶寺石制品的原料和大崗堆山角岩/变质砂岩石料的关系,可以说是讨论一个遗址石器生产的典范研究了。陶寺遗址距离石料来源地近,石器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生产地点从陶寺早期到晚期不断增多,社会精英阶层在中期加强了对石器生产的控制,陶寺生产的石器可能不仅供自己使用,而且输出到其他遗址。相较而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器生产副产品的数量不多,与铜器、绿松石生产的围垣作坊以及骨器生产地点相比,石器生产地点的线索很少,反而附近的嵩山北麓地区出现许多专门生产石器的功能性遗址。它们可能向二里头遗址输送石器。殷墟遗址除发现一批尚未开刃的石镰外,未发现石器生产的副产品,在殷墟遗址已经发现的四组工业区内也未发现石器生产的场所,不能不说石器生产在殷墟应该很不受重视。当然,

作者这里说的石器生产是指日常生产使用的石质工具的生产,不包括一些精美的石质装饰品和礼仪用品的生产。二里头和殷墟发现的石器生产线索和副产品较少可能与发掘者没有给予石器生产足够的重视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可能遗址中石器生产活动确实不多,因为如果他们的石器生产像陶寺一样多的话,二里头六十多年和殷墟近百年的发掘不可能没有发现。因此,作者对陶寺、二里头和殷墟城市化程度逐渐加深过程中都邑内日用石器生产逐渐减少的论断应当是可信的。这一研究从石器生产的角度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手工业生产逐渐贵化的趋势。

另外,翟少冬对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区别的论述也颇为新颖。对于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的区别,之前大多关注在技术上,认为这是磨制和打制的区别。作者除了技术外还关注到石料,认为打制石器的石料多为石英岩、硅质岩、脉石英、玛瑙、碧玉岩等硬度较高、脆性较大的岩石,磨制石器的石料选择则更为多样,大多为遗址附近可以获得的岩石,硬度较打制石器的石料低,便于磨制,上面所说的较多用于打制石器的石料较少用于磨制石器。此部分虽然着墨不多,但言之有理,视角独特,加深了我们对二者区别的认识,也对磨制石器的发展从石料上给予了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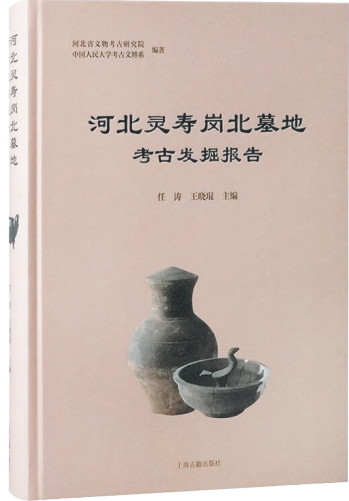
本书的部分内容和观点之前虽然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但本次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完善了之前的论证,并且更加系统化。本书也是作者第一次系统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磨制石器从出现到取代打制石器,以及从在城市中大规模生产到被城市精英阶层逐渐抛弃的石器生产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兴衰关系,为磨制石器生产和社会复杂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值得有兴趣的研究者细细阅读。

石器尤其是磨制石器的研究,在新石器考古领域应当作为一个中心课题,不过参与研究的力量还是显得有些欠缺,已经发表的成果也很有限。现在有了翟少冬的研究成果问世,更显出其重要,可以作为引领相关研究的一座里程碑。翟少冬为追求科学求真,经常投身田野一线,与发掘者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全身心投入工作,成果扎实可靠。翟少冬的研究是认真且细致的,我从她鉴定内蒙古石制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相信会得到研究者的认可,更相信会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从刀铲到珠玉：华北地区的磨制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作者: 翟少冬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5年5月

《河北灵寿岗北墓地考古发掘报告》后记

王晓琨



《河北灵寿岗北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这是系列考古报告的第二部。1998年,为配合朔黄铁路沿线的建设,当时的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动用了几乎全部的业务力量,组织实施了平山县、灵寿县两个铁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清理墓葬超过1000座。参加岗北墓地1998年发掘的人员主要有:徐海峰(领队)、杨景峰、王建伟、任涛(绘图)、王青(绘图)、李瑞林、康三全、郅国法等。

自2018年底开始,投身于岗北墓葬资料整理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王晓琨、张文治、王灯良、邱国斌、张文静、刘爽、孙静怡、李锐莎以及任晨琪等。这份报告乃是集体智慧与辛勤努力所凝聚而成的结晶。

报告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且各部分的人员分工明确。其一为历史及环境背景部分,由徐海峰与陈地成负责撰写;其二是岗北墓地概况,由徐海峰和任涛撰写;其三是岗北墓地北区,由张文静、任涛、孙静怡以及王晓琨共同撰写;其四为岗北墓地南区,由张文静、任涛、陈地成与任晨琪合力完成;其五则是结语部分,由王晓琨与陈地成撰写。而全书的统稿工作则由王晓琨、邱国斌担当。

在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参与的师生们于修复、粘对、器物描述以及类型学比对应实践操作能力均得到了切实的锻炼,收获颇丰。与此同时,还成功挖掘出了全新的科研突破方向。这无疑是一次多方协作实现共赢的良好范例,我们由衷地期望能够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携手前行,在未来创造出更为丰硕的合作成果,为考古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让更多珍贵的历史文化内涵得以揭示与传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灵寿岗北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主编: 任涛 王晓琨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12月

主编/冯朝晖 责编/张宸 校对/郭晓蓉 美编/奚威威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cbcmzk@163.com

苏州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文物事业发展,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积极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同时扎实推进“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积极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古城保护方针,涌现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完善了“马家浜—崧泽—良渚”等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历程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州地区有过数次文物调查活动。这一时期主要为零星的调查考证和地面标本的采集,尚未采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清理及发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文物考古工作日渐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4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文物工作组对苏州五峰山地区土墩墓的发掘,揭开了苏州地区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从1954年至今,苏州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4年至1982年
这一时期苏州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由华东文物工作队、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机构承担。1960年1月,苏州博物馆成立,内设考古组,从此苏州有了自己的考古研究机构。

此时的考古发掘项目数量总体偏少,大部分以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例如,先后发掘了梅堰遗址、越城遗址、草鞋山遗址、张陵山遗址以及吕师孟墓、文娘娘墓、王锡爵墓、毕沅墓、天宝墩汉墓、七子山五代墓等。

第二阶段:1982年至1992年
以1982年入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标志,苏州开始贯彻“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积极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发展策略。苏州博物馆考古组更名为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开始独立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徐家湾、三山岛、龙南、东山村等史前遗址。

全市范围的文物普查为苏州文物考古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共享文物考古资料、推动相关学术研究,这一时期还创办了《苏州文博通讯》等期刊。

第三阶段:1992年至2006年
以赵陵山遗址入选“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992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对草鞋山遗址古稻田进行发掘研究为标志,苏州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向聚落考古、科技考古转型。这一时期还发掘了真山大墓、黑松林墓地、罗墩、少卿山、埤墩等重要遗址,以《真山东周墓地》为代表的等一批较高质量的报告、论文等也相继问世。

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
以2006年苏州博物馆获得团体考古发掘资质、2007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获批成立为标志,苏州考古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期。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等相继开花结果:木渎春秋古城、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分别入选2010、2013、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外,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还发掘了鸡笼山、饒首山、观音山等一批石室土墩墓,以及姜里、朱墓村、唐家角等一批史前遗址,初步形成了苏州东部史前考古、西部吴越文化考古、中部城市考古三大重点研究方向。

近年考古成就

文明探源与研究
2022年11月,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设置“太湖流域文明源头研究”“苏州史前文明发展历程研究”“吴文化探源研究”“苏州古城研究”“苏州地域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研究”五大重点研究项目。苏州成为国内首个实施文明探源工程的地级市。

在探源工程的指导下,先后有草鞋山、塘北、东山村等3项由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主持或参与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有序推进。同时,基建考古成果也不断呈现:2023年3月元和塘古窑址群经过论证被确认为南宋“平江窑”所在地,2024年6月金城新村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召开,遗址揭露了东周至唐宋时期地层堆积。此外,还有三山岛遗址、东山村遗址、草鞋山遗址、黄泗浦遗址、樊村泾遗址等多处考古新发现。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汇聚成了一幅饱含“一万余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五百年建城史”的苏州历史长卷。

文物保护与利用
《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办法》于2006年正式公布,2022年又修订施行。通过修订,确立了“先考古、后出让”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进一步理顺了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作为江苏省首家考古博物馆,苏州考古博物馆预计2025年正式对外开放。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也在2022年6月正式开园,元和塘古窑遗址公园、黄泗浦考古遗址公园等也在加快推进中。

可以说,苏州地区的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已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的合作共赢。

学术成果与合作
学术成果:仅2022年至2024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先后出版《虎丘黑松林墓地》《吴国史新证:出土文献视野下的〈吴太伯世家〉》《学术集——吴文化器物与文献研究》《苏州草鞋山遗址出土文物》《苏州出土文物精粹》《苏州考古资料汇编》《企致集——苏州考古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苏州考古七十年：回顾、成就、展望

程义

等专著7部,发表各类简报、论文60多篇(含核心期刊11篇)。

公众考古:研究所参与主办的“苏州大讲坛·文明探源系列讲座”,邀请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搭建起一个权威研讨平台;参与制作的苏州地域文明探源系列短视频《苏从何处来》,获评“2023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

对外合作: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四家单位签订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战略合作协议。此外,还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江苏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苏州市测绘院等单位进行多学科合作与研究。

机构建设与发展
管理机构:研究所目前已建立木渎基地和多个临时考古工作站,逐渐形成“考古博物馆+基地+考古工作站”相结合的“1+N”模式,有效服务大市范围。

人才体系:研究所现有事业编制30名、公益性岗位5名,2023年以来先后引进十余名硕、博士毕业生及劳务派遣人员,极大充实了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学术平台:研究所先后合作共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环太湖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苏州工作站、王陵院土苏州工作站等学术交流平台,以及苏州市吴越史地研究会等社会组织,未来将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与桥梁纽带作用。

未来规划展望

未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将持续推进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不断完善机构建设,逐步扩大合作交流,除完成基建考古等基础工作,还将重点推动以下几方面内容:

持续整理历年发掘资料,力争出版一批高质量考古成果

扎实推进前期积压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编写工作,努力实现“以老带新”传帮带,“以新促老”共提高,不断提升项目负责人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水准,推动苏州考古工作由田野技术型向学术研究型提升。

以苏州考古博物馆为平台,加大考古成果展示转化力度

苏州考古博物馆将以文物保护传承为核心理念,以现代化博物馆为展示平台,以公众考古教育为服务导向,以石湖自然景观为环境依托,有效整合苏州考古资源、展示苏州考古成果。同时,还将与渔农村文化旅游项目等文旅资源形成乘数效应,充分发挥考古资源的科研、教育、研学、游憩等功能。

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构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成长体系

支持联合开展重大考古项目、考古研究课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交流,强化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实行“请进来、走出去”,促进优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引进或培养实用型、研究型、复合型人才,逐步形成专业结构科学、年龄梯队合理的人才队伍体系。

人才队伍实际出发,探索“基建考古+学术研究”的工作模式

苏州地区的基础建设高潮已开始回落,基建考古项目也会随之减少,并且从中心城区向外围郊县扩展的趋势不断加强。

新时代,新使命。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应时刻加强课题意识,从量向质转变,着重本地特色,全面提升文物保护传承、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水平。

弹指一挥间,从1954年五峰山的首次考古发掘至今已经七十年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州考古人扎根田野、栉风沐雨,用一把把手铲揭开埋藏在这片沃土之下的文物瑰宝,也使苏州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机构建制方面,从1960年的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到2009年升级成立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再到馆所一体化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考古博物馆),走在了全国地市级考古机构的前列;发掘成果方面,先后有4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填补了诸多研究空白、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新起点,新征程。未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将多措并举、扎实高效推进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苏州文物考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苏州力量,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考古支撑。

(本文系该书库序言,略有删减。作者系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企致集:苏州考古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编著: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